

清及近代传世《诗集传》宋刊本概述

吕 艺

朱熹《诗集传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的是八卷本。元代又曾有十卷本。但是据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，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三八《艺文》部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《诗集传》的宋本都为二十卷。元代的十卷本，当已是后人所更改；至于八卷本，明代始有出现，盖“坊间妄并也”。^①朱熹是南宋人，所以《诗集传》的宋版，都是南宋刊本。朱熹撰《诗集传》，在学术思想上有由尊序到驳序的转变，著述上也有初稿与改定稿之别。他为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作序，自言：“此书所谓朱氏者，实熹少时浅陋之说，而伯恭父误有取焉。其后历时既久，自知其说有所未安，……或不免有所更定。”当时，初稿与改定稿同被刊行流传。朱熹孙朱鉴曾说：“初脱稿时，音训间有未备，刻版已竟，不容增益。”^②说初稿与改定稿的区别只在“音训间有未备”，显然是回护之言。但初稿亦曾刊版流传，不容置疑。二稿并行于世，这就增加了《诗集传》版本的复杂情况。其后各种刊本、校本、改易本纷纷迭出。陈振孙曾云：“今江西所刻晚年本，得于南康胡泳伯量，校之建安本，更定者几什一云。”^③朱鉴《诗传遗说》后序，也说当时有豫章、长沙、后山诸本，其中“后山讎校为最精”。后来朱鉴到富川，又就《诗集传》初

稿“亲加是正，”^④另刻过一个本子。但是到了清代，时代久远，屡经变故，宋刊版本已稀，而且多为断章残卷。各种版本的渊源关系及在宋、元、明各代的流传情况，也大多晦暗不能辨。本文打算仅就清及近代尚存的宋刊本《诗集传》，据版本情况分为几个系统，分别介绍其版本状况和在清及近代的流传概况。

一、半页七行、行十五字版本系统：

此系各版本行数、字数基本相同（有的本子内，间有行十一、二字者），版式也基本相同：左右双边，白口、单鱼尾（某些页偶有双鱼尾），版心上记大、小字数，中记书名、卷数、页数，下记刻工姓名。字体、刻工亦同。

1. 陆心源所宋楼藏本（残）

此本自卷十二《小雅·蓼莪》第三章朱注“则无所恃”四字起（即十二卷第二十二页始），至卷十七卒篇《大雅·板》各卷亡佚，后抄补配齐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陆心源子陆树藩将陆氏藏书卖与日本岩崎氏，藏于静嘉堂文库，此本也随之东去。

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曾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静嘉文库本，尚可窥见陆本面貌。

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五、日本人河田巖撰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一、长泽规矩也编《善本影谱》第六辑，都说此本为五砚楼主人袁廷桢旧藏。考钱大昕《竹汀先生日记钞》卷一曾云：“晤袁又恺，见宋刻朱文公《诗集传》…，此大字本，每叶十四行，行十五字。”《善本影谱》第六辑有此本卷一第一页前半页书影，版框外右下方有两方印，一作“袁廷桢印”，一作“五砚主人”，则此本确为袁廷桢旧物。袁廷桢为清乾、嘉时人，字又恺，又字寿阶，吴县（今江苏吴县）人。“其先有兄弟六人，以文行显”，^⑤在明代号为“六俊”，“为吴下望族。”^⑥袁廷桢因收得五位先人遗砚，所以筑楼以“五砚”名之。此本在袁廷桢之前，清代题跋、目录中未见著录，不详其所自出。袁氏“家饶

于资，……遗书万卷”，^⑦此本或许即袁氏祖传之物。袁廷椿虽“饶于资”，但性喜交游，与当时名士钱大昕、段玉裁、顾广圻、钮树玉、袁枚、王昶等人过往甚密，“诗酒流连，应接不暇”，又“不治生产，且喜挥霍”，^⑧于是家道中落，所藏宋槧元刻珍本也典与他人。

此本在袁廷椿之后，最早为陈鱣所得。陈鱣字仲鱼，号简庄，又号河庄，海昌（今浙江海宁）人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举孝廉方正，三年（1798）举人。“雅好藏书，宋雕元槧及近罕见本，不惜厚值”。^⑨袁廷椿自云：“嘉庆乙丑（十年、1805）夏季，以家藏宋刻本换与陈仲鱼。”^⑩陈鱣《简庄文钞》（又名《缀文》）卷三《宋本诗集传跋》也说：“…适袁君又愷语及其家藏宋本《诗集传》，因以他物易之，……惟自《小雅·蓼莪》至《大雅·板》之篇已缺…”可知此本是在嘉庆十年通过典卖关系转归陈鱣的。陈鱣在跋文中，列举宋本之善、可补正俗本之处，共十四条，其中两条云：俗本“家伯冢宰”（见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），宋本作“维宰”；“降于卿士”（见《商颂·长发》），宋本作“降予”。但是陆心源后来藏的本子，“维宰”实作“为宰”，“降予”作“降于”，见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一。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亦确如此，这就出现了问题：陆本是否就是陈鱣收藏过的本子？为什么有不同之处？对此，《仪顾堂续跋》认为是同一个本子，之所以有异，是因为“恐仲鱼当时即据《提要》所举作跋，未尝逐一覆检耳。”这是有道理的。

在陈鱣之前，清人冯嗣京、陈启源曾校过《诗集传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并录之。冯嗣京是据注疏本校近行本，得校记十二条，这两条就校作“维宰”、“降予”。陈鱣作跋，是参考了《四库提要》或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的（《毛诗稽古编》亦录冯嗣京校记）。他在列举了十条当刊正之例后说：以上“为冯嗣京、陈启源所拈出。”这两条正在其中。所以陆氏说陈鱣“未能逐一

覆检”，是很有可能的。而且如果陆本非陈鱣曾见之本，自当有别本与陆本并世，清代目录、题跋中也应有所反映。但陆本之外，并无另一个袁廷桢曾收藏，后归陈鱣的本子出现，清代文献中也不见记载（清吴之瑗题跋中曾怀疑另有一本，但不可信，详见下文）。因此，在没见到新的资料和实物证据之前，我认为陆本即是袁廷桢原藏，后鬻与陈鱣的本子。

在陈鱣与陆心源之间，此本又曾传至汪蕓国手。这见于清人吴之瑗的手跋。汪蕓国生平未详。吴之瑗跋文中称其为“参军”，“为紫阳所自出”，则汪蕓国盖为安徽婺源人。“参军”，是旧称，明清多借指掌管公文出纳的经历，则汪蕓国大概任过此职。书传至汪蕓国手，由此引出一段公案：吴之瑗认为汪氏藏本非陈鱣所见本。因为吴氏手跋是附于陆本卷首的（今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挪至卷末），故可知吴氏所指的本子就是后来的陆氏藏本。为了说明问题，详引吴跋如下。

吴氏说汪本，“自《蓼莪》注‘则无所恃’四字起至《大雅·板》篇均影钞，前后一无题识，惟每册或有‘袁廷桢印’，‘五砚主人’小方印，或有‘袁又恺藏书’、‘枫桥五砚楼收藏印’小长印……是本岂即徵君（指陈鱣）故物耶？抑袁君别有一本耶？何缺页之相符与？……惟《小雅》‘家伯维宰’已作‘家伯为宰’，《商颂》‘降于卿士’已作‘降于’；又《周颂·臣工》篇注：‘畚，二岁田也’，‘二’当为‘三’……考元番阳朱公迁《诗经疏义》二十卷，初刻于正统间，重刻于嘉靖二年（1523），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云是书虽刻于明之中叶，犹为元儒手笔，悉仍文公之旧，惟‘家伯维宰’作‘为宰’。据此，则是本或为宋刻而元时翻雕者？其缺卷及图印又书贾作伪，以同于徵君所藏本，冀获厚值耳。”

吴之瑗认为汪本（即陆本）大概是元人翻雕、非陈鱣所藏本的理由是：1. “为宰”、“降于”与陈鱣所言不合，2. 《周颂·臣工》注“二”当作“三”，3. 元人朱公迁《诗经疏义》作

“为宰”。关于第一点，前文已论及。至于第二点，我以为不成其为理由。因为吴氏所言，只是自己认为当作“三”，不当作“二”，在没有版本根据的情况下，安知宋刻必作“三”而不作“二”，又安知朱熹注书便没有疏忽之处呢？吴氏以为，朱熹《小雅·采芑》篇注“田一岁曰菑，二岁曰新田，三岁曰畬”，《周颂·臣工》又注“畬，二岁田也”，“一人手定之书，不当有此异说。”^⑩于理推之，固当如此。但在我们所校的宋、元诸刻本中，没有一个本子《臣工》篇的“二”作“三”。而且宋刻《诗集传》朱注前后的矛盾并非只此一处，如卷一《召南·驺虞》注：“豨，牡豕也。”而卷十《小雅·吉日》注却说：“豕牝曰豨”。所见宋刻诸本皆如此。这应该说是朱熹的疏忽或宋人所误，而不应作为元人覆刻的证据。至于仅据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语，便把“维宰”作“为宰”当成元人翻雕的证据，也是不可靠的。因为如前所说，校作“家伯维宰”的，始于清人冯嗣京。但冯嗣京所据的是注疏本，而非《集传》原刻。事实上，在我们所校的宋、元刻《诗集传》中，宋本都作“为宰”，元本中也只有北图藏十卷本作“维宰”，由此看来，倒是作“为宰”更近于原刻。当然，我们并不否认《诗集传》宋刻板有为元人甚至明人覆改的可能，但是吴氏提出的证据实在不能使人信服。因此，我认为汪蕻国所藏的本作子，就是陈鱣藏过的本子。陈鱣卒于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。^⑪虽然他生前酷嗜书，曾刻“得此书、费辛若，后之人，其鉴我”之印，勉励后人珍藏，但“没不数载，后人无识”，藏书“为茗上书贾赚去。”^⑫自嘉庆二十二年到吴之瑗作跋的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，其间历三十余载，陈鱣书早已散失，所以汪蕻国是完全有可能得到的。而且，在后来的流传中，再无第二个所谓陈鱣藏本出现，也是有力的佐证。

关于此本的版刻渊源，陈鱣《简庄文钞》卷三的跋文说：“考文公孙鉴《诗传遗说叙》云：‘《诗集传》，豫章、长沙、后山

皆有本，而后山校讎最精。’是本无题识可证，而校讎之精，疑为后山本。”后山，当指当时福州路南剑州之将乐县（今属福建省）。《大清一统志》卷四百三十说，后山“在将乐县治后，城环其巔，左支为含云山，宋杨时筑室读书于此……正支为钟翠山，山后有后山泉”。福建是宋代刻书的重要地区，将乐又是文人聚集的地方，刻书大致是校讎较精的。不过陈鱣只据“校讎最精”，便“疑为后山本”，则不足为据。此本的刻工姓名、避讳用字及字体，对于考证此本的刊刻时间及刻书地域，倒是提供了一些线索。

此本刻工是黄埜、蔡友、郑恭、吴炎、王焯、蔡明、游熙、贾直、马良、何彬、周嵩、张元或、蔡仁、杏、贾端仁、刘霁。日本人长泽规矩也曾著《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一文（见载《图书馆学季刊》八卷第三期），对一百三十种宋元刊本中的刻工作过归纳统计。据此表，黄埜又刻过淳熙本《史记》，王焯、吴炎、马良三人又刻过宝祐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二书现藏日本静嘉文库。考《仪顾堂题跋》卷二《宋耿秉槩本史记跋》，淳熙本《史记》是南宋孝宗淳熙辛丑（八年、1181）耿秉守桐川时所刻。又考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七《宋淳祐湖州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跋》，此本为“宝祐六年（1258）赵与祐刻本”。因“首载淳熙元年（1174）杨万里序、宝祐丁巳（五年）赵与讐序”，故“淳、祐”合称。赵氏“居湖州城内之丛桂坊”，此书是他“退而里居”所刻，故为湖州刻本。自淳熙八年至理宗宝祐六年，间隔七十余载。而《史记》也不见得是黄埜参与刊刻的第一部书，即便如此，以黄氏二十岁开始刻书计，至宝祐六年也已九十余岁，尚能操刀刻书，似不大可能。所以《诗集传》当刻于此前。且此本避讳至“鞞”字，乃避宋宁宗赵扩（“鞞”与“扩”音同）讳，则此本当刊于宁宗以后至理宗宝祐六年之前，即一一九五至一二五八年之间。湖州，治所在今浙江吴兴，南宋属两浙西路。桐川，宋时

指广德军，治所在今安徽广德县，宋时与两浙西路安吉县接壤。安吉又正是湖州所辖县。黄奭当是先桐川刻书，后来又与湖州王焯、吴炎、马良一起刻书的。安吉又距临安不远，所以此本很可能是湖州或临安一带刻本。而且此本字体为欧体字，版式为左右双边、白口、单鱼尾，这都是南宋浙本通常具有的特点，因疑此本为浙刻本。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一著录一个宋刻《诗集传》残本（见后），刻工有张仪、何彬、蔡明、蔡仁、蔡友。王氏以为是“宋临安刻本”，不知何据？不过，从刻工上看，王氏所见本和此本都刻于浙江湖州或临安一带，大概是不错的。

2. 吴騫藏本（残）

此本只存八卷，至《豳风》止，自《小雅》开始缺。吴騫子吴寿暘所编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卷一《诗集传跋》说，此本“经文悉与唐石经同，注文悉存文公原本，与徵君所藏宋刻相伯仲”。因疑与陆心源本为同一系统。八二年八月，因参加阴法鲁先生主持的《诗集传》校释工作，到南京图书馆，打算借此本一阅。但因善本书籍装箱防潮，未能亲见。据图书馆的同志比勘后介绍，此本与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行款格式、字数、刊工姓名皆同，唯版框尺寸稍大，则当与陆本为一系。

此本是陈鱣从吴中为吴騫购来的^⑭。吴騫字槎客，海宁（即海昌）人，和陈鱣是同乡。“笃嗜典籍，遇善本，倾囊购之，校勘精审，所得不下五万卷，筑拜经楼藏之”。^⑮他与陈鱣同为海宁两大藏书家，交往甚笃，“得宋本，互相钞藏”。^⑯大约陈鱣已得袁廷桢藏本，此本与袁本同，缺卷又比袁本多，没有必要再藏，因此转让给吴騫的。

据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，此本“系明晋府图书，每册皆有印记”。吴騫曰：“按《明史·诸王传》，晋恭王封于太原府，传至裔孙表栾，孝友好文，分封庆成王，此岂其故物耶？”但朱表栾所承王号，是明晋恭王之子济炫的庆成王号，并非承晋王号。

此本却是晋府印记，恐非表栾故物。按《明史》卷一百《诸王世表》、卷一百十六《诸王传》，明晋恭王朱棡，是明太祖第三子，洪武三年（1370）封为晋王，十一年（1378）就藩太原。后子孙更迭相承，至明末最后一代晋王，名朱求桂，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袭封号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，“不知所终”。此本既然每册都有晋府印记，当然是晋王故物。祖孙相传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一般只能传至直接承袭晋王名号的后代，这是常理。如果仅以庆成王朱表栾“孝友好文”，便指此本属他保存，未免失之率尔。

吴騫之后此本的流传情况，《（增定）四库简明目录标注·诗集传》“附录”中引黄绍箕语，认为“吴氏本今归陆氏，自《蓼莪》注‘则无所恃’四字起，至《大雅·板》篇影钞……。”这是错的。首先，吴本只八卷，自《小雅》开始缺，缺《小雅·蓼莪》注至《大雅·板》的是袁本。这在邵懿辰《标注》中也言之甚明，不知黄氏为何视而不见？其次，吴氏本并未归陆心源，无论《皕宋楼藏书志》或《仪顾堂题跋》、《续跋》中都未有著录。从缺卷情况分析，黄氏是把袁本误当作吴本，所以认为归于陆氏了。吴本后归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钱塘丁氏，见载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。丁氏藏书，光绪末年归原江南图书馆。现藏南京图书馆。

3. 北图藏宋刻明印本（足）

一九三三年，赵万里先生编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曾著录两个题为“宋刻明印”的《诗集传》本。一为足本，二十卷；一为残本，缺第三、八、十三卷。据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阅览室王新同志介绍：抗战前夕，原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及部分线装古籍，曾运至重庆、上海等地。抗战胜利后，部分珍本未运回馆，而留存上海。解放前夕，被劫运美国。此二本即在这批图书中。五十年代，王重民先生自美国弄回这批书的缩微胶卷。六十年代，美国政府将这批书运交台湾。现在北图只存有二十卷本的胶卷。从胶片上看、行款、版式、字体、字数、刻工姓名，乃至页数，

皆与四部丛刊影印本同。惟卷十二《蓼莪》注至卷十七，陆本原缺，后抄配，而此本为足本，所以此数卷内异同较多，页数亦时有不同。经过校勘，其余的部分二本许多特征完全一致。如卷八、十页注，影印本“也；桑土，桑根皮”六字极小，当为挖补，此本同；卷八、十六页注，影印本“黼，九日黻，皆绣于袞，天”九字亦挖补，此本亦同；又卷二十、二页注“白马黑鬣曰骆，赤身黑鬣曰骝”十二字，影印本有挖补痕迹，此本亦同，等等。由此可知此本当与陆本为同一版本之不同印本。此本与影印本也偶有异同（陆本缺卷部分不算），如：卷四“《王》一之六”下朱注“晋文侯、郑武公迎宣白于中而立”。影印本“立”下空一格，此本有“之”字；卷十“《彤弓》三章，章六句”下朱注，影印本“拜表辄行者异矣。”此本“辄”写成“輶”等等，大概是由于后人修版所致。至于是否明印，未有证据，不敢断言。目前可见的《诗集传》宋刻，只有此本为足本，故此本即使印刷时间较晚，有后人递修的可能；但也可补正他本，用作校勘之资。

此本卷一“诗卷第一”下，有“安乐堂藏书印”，朱色阳文、长方形。“安乐堂”，是清宗室允祥堂号。允祥为康熙二十二子^①，雍正即位，封他为怡亲王，亦好藏书。雍正八年（1730）卒。此本当经他收藏过。

十七卷本，不知版本情况如何。不过赵万里先生既同著录为宋刻明印本，加之当初制作微缩胶卷，只制了二十卷本而未制十七卷本，估计是因为两本亦属一系，所以没有重复制作的必要了。

4.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（残）

一九五五年，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《诗集传》二十卷。《出版说明》说：“本书据宋刊本断句影印”，但未言版本来源。在校勘《诗集传》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本子。首先，此本也是残本，所残部分自卷十二《小雅·蓼莪》注“则

无所恃”起至十七卷终，与陆本完全一样。所缺部分亦系抄配，抄写墨迹与陆本丝毫不差；其次，此本卷三末有一阴文方印：“归安陆树声叔□之印”，卷六及卷十七末又有“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”阴文方印。而陆本也有这两种印记，那么此本亦当曾为陆氏收藏过。但是陆氏《文集》、《藏书志》及《题跋记》、《续跋》却从未言藏过两个缺卷相同的宋本；再次，此本行字数、篇章、卷页数，甚至字体特征都与陆本一样，衍讹脱落亦同。只有个别例外：《周南·麟之趾》朱注，四部丛刊影印陆本作：“文主后妃仁厚”，此本“主”作“王”。但此本版式特别，陆本版心有书名、卷、页数、大小字数、刻工姓名，此本悉无，每半页以粗黑线四面为框；最后，此本的版本来源不清，类似的版本前人书志、题跋、目录中均未见著录。

对此本细加辨别之后，我以为，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的所谓“宋刊本”，恐怕是个贗本。

前文提及，清人吴之璥为汪蕙国本作跋，曾怀疑当时有两个缺卷相同的本子：一个是汪本，另一个是袁廷桢、陈鱣传藏的本子。此本会不会是吴氏认为他未曾得见的陈、袁藏本呢？我们在前文已论及，汪本就是袁、陈二人曾藏、后归陆心源的本子。退一步说，即使当时真有陈氏本藏之名山而未出，也决不会是此本。因为如前文所言，汪之璥所以会认为另有陈鱣本，主要是因为陈鱣跋文中列举的校记，有两条与陆本不合。一是“家伯维宰”，陆本作“为宰”；一是：“降予卿士”；陆本作“降于”。如果此本是陈本，那么这两条应与陈鱣所言同。但是此本却同于陆本，作“为宰”、“降于”。而且，有陆氏印记也无法解释。那么，会不会就是陆本呢？也无可能。陆本现藏日本，暂且不说。首先，此本版式与陆本不同，前文已提及；其次，此本与陆本文字有差异，如前文所云“文主”、“文王”之别。虽然差异只此一处，但反映出毕竟不是一个本子。但此本明明有陆氏印记，许多特征

又与陆本一样，怎么解释？我以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：此本恐为后人伪造。细加分析，可以看出作伪的痕迹及手段。

作伪者露出的最大破绽，是版框尺寸。此本的版框尺寸与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影印本各页内框对应相等。影印本每页的版框尺寸不是绝对相等的，一般纵14厘米左右，宽10厘米左右。但据日本人长泽规矩也编的《善本影谱》注，陆本原书“纵六寸二分弱，横四寸四分强”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时为了使所出书的版式整齐划一，是缩小了尺寸的。而且，就我们所知，半叶七行、行十五字系统的宋本，原书尺寸都比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大：北图所藏宋刻明印本，半叶尺寸是18.6×13.3厘米；丁本（吴騫本）虽未亲见，但是南图同志也介绍说原书版框要比《丛刊》本大。而此本版框尺寸却与《丛刊》影印本同，这就露出了破绽。而且，此本的版本来源也不清楚。虽然此本有陆氏的两种印记，但是陆氏从未言得过此本，这只能是欲盖弥彰。此本是刊本，而刊过缺卷自十二卷至十七卷宋本的，只有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影印的《四部丛刊三编》。加之版框尺寸相同，因此，我以为作伪者大概是据《丛刊》本，将版心描为粗黑线，为了相称，又在四面加粗黑框；再把“文主”改为“文王”，便成此本。最后，还有印章问题。前文提及，此本卷三与卷六，卷十七末页分别有陆氏的一种印记。与《丛刊》影印本的对照，印章大小、字体特征完全相同，不象是伪造。但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上陆氏印记的数量又比此本多，这是如何作伪的？两本细对之后，我们发现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卷三末页，也是“归安陆树声叔□之印”，而卷六、卷十、卷十三、卷十七、卷二十末页，皆为“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”的印章，这两种印记不仅分别与此本两种印记的卷、页数同、文字同、而且盖戳的位置也分毫不差。这就可以知道，作伪者大概是把卷三、卷六、卷十七末页的印章保留，其余的挖去，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

5. 北大藏本（残）

此本只存卷十四（七至十一页）、卷十五（三至十一页）、卷十六（十六至十七页）、卷十七（第一页），名为四卷，实际不过十数页。陆本原缺卷十二至卷十七，为后人抄配。将此本与北图藏宋刻明印足本对照，行款格式、行、字数悉同。此数卷内每页的刊工姓名亦同，为刘霁、何彬、杏、王焯、蔡仁、张元或、吴炎、蔡友诸人；可知此本与北图本、陆本为同一版本系统。但此本既无牌记，又无藏书印章，不知其本所自出。

此外，本系统宋本，见于图书目录、书志题跋的，尚有：

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一，著录一“宋临安刻本”，存卷四至卷八，卷十四至卷十七，版式、行、字数与陆本、北图本同，刻工为张仪、何彬、蔡明、蔡友、蔡仁诸人；

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著录存十一卷的宋刊《诗集传》，半页七行，行十五字，白口，上有大小字数，下有刻工姓名；

《上海图书馆善本目录》著录一宋刊本，半叶七行，行十五字，存卷七、八，残二十叶。等等。

以上皆未亲见，不能详述。

二、半页八行，行十七字系统

此系版本，就目前所见，仅存瞿镛铁琴铜剑楼本。此本仅存第十六卷“文王之什”（内残一页）。半叶八行，行大字十六、七不等，小字十七。左右双边，外框粗黑线。版心上记大、小字数，中记书名、卷数，下记页数、刻工姓名，此本后归北京图书馆。

此本刻工姓名，可辨者有黄彦、余中、“宪刊”、“如”、“蔡”等。据《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，黄彦又曾参与广东漕司刊刻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诗》之事，此书现存日本静嘉文库。《仪顾堂续跋》卷十二《宋槧九家注杜诗残本跋》云：“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诗》，存卷六至十一，凡六卷，每卷后有‘宝庆乙酉（理宗元年

1225) 广东漕司侵板,一行……”。则瞿镛所藏宋刊《诗集传》大概也刊于宝庆前后耶?

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著录此本时,未言得自何人。今观此本,除瞿镛印记外,又有“陈淳之印”、“白阳山人”及“恬裕斋镜之氏珍藏”的印记。陈淳,“字道復,后以字行,别字復甫”^⑧,生于明成化二十年(1484),卒于嘉靖二十三年(1544),苏郡长洲(今江苏吴县)人。祖陈瑀,“字玉汝,成化戊戌(十四年,1478)进士”,^⑨曾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;父名陈钥。陈道復“少从文徵明游,凡经学、古文、词章、书法、画品咸臻其妙,其后书画自成一家”。^⑩他一生淡泊为怀,不求仕进,以其先墓在白阳山,故自号白阳山人。^⑪

恬裕斋,是瞿氏藏书之所,始建于瞿镛父瞿绍基。绍基字厚培,别字荫棠,“尤嗜书籍,值佳本必购之。”^⑫他在常熟两大藏书家张金吾、陈揆的藏书散失之际,“復遴其宋元善本为世珍者,拔十之五,”^⑬奠定了瞿氏藏书的基础。镜之,是瞿镛子。^⑭则此本传自明代陈道復,到了清末,被瞿氏世代珍藏,后归北图的。

※ ※ ※ ※

如上所述,清及近代传世的《诗集传》宋刊本,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。其中半叶七行、行十五字系统的刊本传世较多,且有全帙可见,因而尤其重要。最后,尚有清代内府所藏宋刊《诗集传》二十卷(足)应当提及。

此本见载于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二,“四函十六册……前有《诗传纲领》、《诗图》、《自序》、《大小序》。李霁家藏本。霁,高阳人,顺治丙戌(三年,1646)进士,官至大学士”。《书目后编》还录有“据梧居士”、“李霁”、“谦牧堂藏书印”、“谦牧堂书画记”四印。云:“以上俱每卷首。”李霁字景霁,别字坦园,直隶高阳(今属河北)人。“据梧居士”为其

别号。父李国樞，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进士，为明末显臣。李霁在康熙朝，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，进太子太师，卒于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。^⑤“谦牧堂”，是清人揆叙的堂号。揆叙字凯功，纳喇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大学士明珠子。康熙朝历官翰林院掌院学士、礼部侍郎、教习庶吉士、工部侍郎等，亦为当时权臣之一，卒于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。^⑥乾隆时，曾命内廷翰林集善本，贮之昭仁殿，名曰：“天禄琳琅”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重加整比，辑成书目十卷，为前编。至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乾清宫交泰殿火灾，延及昭仁殿，前编之书全为煨烬。于是又重集善本，并编成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。据此，则此本在清代当始存于李霁家，后归揆叙，嘉庆年间，归于清秘府。所以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时，尚未及见此本，而只著录了明以后流传的八卷本《诗集传》。《后目》虽云此本为宋刊，但尚有可疑之处。因为在书前附《诗传纲领》、《诗图》，是元以后刊本习见的款式，现在可见的宋刊本皆无，宋代题跋、目录也未言。而且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著录的宋刊本，不如《前编》可信，清人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言之甚明。所以此本是否宋本，尚不能论定。解放以后，故宫原内府尚存之善本，都归北图，但北图今无此本，不知是清亡之前已流失？还是被运往台湾？《书目后编》又未言行款版式，私家书目也不见载，此书的版本情况，既不得而知；所疑之处也不能辨析，姑且就所知言之一二，附于文末，以飨读者。

注

①陈鱣《简庄文钞》卷三《宋本诗集传跋》。

②《诗传遗说》后序。

③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。

④《诗传遗说》后序。

⑤袁廷桢《红蕙山房吟稿》附丁兴复撰《袁寿阶先生传》。

- ⑥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卷四。《袁廷桢生平》
- ⑦丁兴复《袁寿阶先生传》。
- ⑧《汉学师承记》卷四。
- ⑨吴衡照《海昌诗叙》。
- ⑩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三校宋本《诗集传》跋文引。
- ⑪吴之璠跋，见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影印本《诗集传》卷末。
- ⑫《碑传集补》卷四十八钱泰吉所撰陈鱣《传》。
- ⑬吴衡照《海昌诗叙》。
- ⑭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卷一《诗集传》跋。
- ⑮《碑传集补》卷四五引《杭州府志·吴騫传》。
- ⑯钱泰吉《曝书杂记》卷上。
- ⑰《碑传集》卷一彭绍升撰《和顷怡贤亲王允祥传》。
- ⑱《陈白阳集》附录载明张寰撰《白阳先生墓志铭》。
- ⑲光绪《苏州府志》卷八六《陈璠传》。
- ⑳光绪《苏州府志》卷八六《陈道复传》。
- ㉑同上。
- ㉒《碑传集补》卷二七李兆洛撰《署阳湖县学训导瞿公墓志铭》。
- ㉓黄廷鉴《第六弦溪文钞》卷二《恬裕斋藏书记》。
- ㉔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宋翔凤序。
- ㉕参《明史》卷二五一《李国楷传》、《碑传集》卷四王熙撰《李騫墓志铭》、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五十《李騫传》。
- ㉖参《国朝诗人徵略》（初编）卷二十、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八十七。